

数字反哺和代际沟通下互惠性孝道对代际团结的影响

王俊杰

江苏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江苏 徐州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6日

摘 要

随着数字化发展与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推进, 家庭代际互动的内容与形式正在发生变化。年轻一代凭借数字技术和信息获取方面的优势, 为父母提供数字技术指导、信息支持与数字生活协助, 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数字反哺行为。与此同时, 孝道也并非单一的传统规范, 而是包含权威性孝道与互惠性孝道等不同心理取向。其中, 互惠性孝道强调亲子之间的情感联结、相互支持与关系维护, 可能成为子代主动参与家庭支持行为的重要心理基础。基于二元孝道理论与代际团结理论, 本文以互惠性孝道为基点, 将数字反哺行为作为行为机制, 家庭代际团结作为关系结果, 并进一步从家庭沟通模式视角考察代际沟通的情境作用。通过梳理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 本文认为, 互惠性孝道可能通过增强个体的关系维护与回馈动机, 促使年轻一代更多参与数字反哺, 从而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互动支持与价值认同; 与此同时, 开放、平等的对话取向可能为上述价值取向向实际支持行为的转化提供更加有利的家庭互动环境。

关键词

代际关系, 数字反哺, 互惠性孝道, 代际团结

The Impact of Digital Reverse Socializ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The Role of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Junjie Wang

Faculty of Educatio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Received: September 17, 2026; accepted: October 13,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6, 2026

文章引用: 王俊杰(2026). 数字反哺和代际沟通下互惠性孝道对代际团结的影响. *心理学进展*, 16(10), 365-373.
DOI: 10.12677/ap.2026.1610501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digitalization and population aging, the content and forms of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are undergoing significant changes. Leveraging their advantages i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access, the younger generation provides their parents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guidance, information support, and assistance in digital life, thereby forming a digital reverse mentoring behavior (digital feedback) characterized by the zeitgeist. Meanwhile, filial piety is not a singular traditional norm; rather, it encompasses diverse psychological orientations, including 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 and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Among these,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emphasizes emotional bonding, mutual support, and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nd may serve as a crucial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proactive engagement in family support behaviors. Grounded in the Dual Filial Piety Theory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Theory, this study takes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as the focal point, positions digital reverse mentoring as the behavioral mechanism, and regards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s the relational outcome. Furthermore, it examines the contextual role of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By synthesizing relevan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posits that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may enhance individuals' motivations for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and reciprocity, thereby encouragi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participate more actively in digital reverse mentoring, which in turn promotes emotional bonding, interactive support, and value consensus among family members. Concurrently, an open and egalitarian conversation orientation may provide a more conducive family interaction environment for translating these value orientations into actual support behaviors.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Digital Reverse Socialization,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21 世纪现代化浪潮盛行, 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和转型, 中国的家庭关系变迁也并非像现代化理论描述的那样出现核心家庭的孤立化, 而是变成子代与亲代的相互影响, 家庭代际关系始终紧密(刘汶蓉, 2016)。有学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传统孝道文化(曹惟纯, 叶光辉, 2014)。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孝道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 一直深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维系着民族的气与魂。传统的孝道包含了太多内涵, 本文采用二元孝道理论, 根据孝道的互惠互动新模式, 着重研究互惠性孝道对代际团结的影响。

互联网、移动支付以及社交媒体等智能化的迅速崛起,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人们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沟通交流, 而是利用科技改变生活。但与智能化并行的还有人口老龄化, 随之而来的就是老龄人口的滞后性问题, “落伍”其实一直都很流行, 并且存在于每个年龄段。这时便产生了一种现象, 作为“网络原住民”的年轻一代通过教授年长一代使用数字技术并协助他们了解数字生活空间, 形成“数字反哺”的新型代际互动方式(Loges & Jung, 2001)。数字反哺使家庭内部的信息流动不再是亲代对子代

的单向输出，而是亲代与子代的双向互动，中国的传统家庭结构也不再只是权威输出，而是出现了存在于数字空间的子代对亲代的“反向教化”，这些都为代际团结提供了新的心理与社会机制(夏当英，张雨豪，2024)。

除了因为数字技术而出现的数字反哺现象，代际沟通模式也会影响互惠性孝道对代际团结的影响。由于数字环境的不断深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代际交往。中国的传统家庭中，亲代往往很重视对子代的培养，要求他们尊敬师长、孝顺父母等，子代也是深受教诲，循规蹈矩。但受数字环境的影响，年轻一代逐渐重塑自我和家庭的身份认同，对家庭关系和父母权威也有了不同的声音，由此不同的代际沟通方式会出现不同的家庭代际团结关系(Zhou & Gui, 2017)。本文主要研究代际沟通的两种取向，探讨其在互惠性孝道、数字反哺和代际团结中的调节作用。

综上，互惠性孝道不仅体现为个体对父母的价值认同，也可能通过具体的代际支持行为表现出来。在数字化社会背景下，年轻一代所具有的数字知识与技术优势，为孝道价值向家庭支持行为的转化提供了新的行为渠道。具有较高互惠性孝道水平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关注父母的数字生活需求，并通过技术指导、信息支持和数字生活协助等方式实施数字反哺；而数字反哺又可能通过增加代际互动机会、促进资源与信息交换以及强化情感联结，进一步影响家庭代际团结。然而，个体是否能够将互惠性孝道转化为实际的数字支持行为，还可能受到家庭互动情境的影响。对话取向较高的家庭鼓励成员表达观点、分享信息并参与共同讨论，可能为孝道价值向数字支持行为的转化提供更加开放的互动环境。因此，本文拟构建“互惠性孝道-数字反哺-家庭代际团结”的中介模型，并考察代际沟通模式的调节作用，以揭示数字化背景下传统孝道价值影响家庭代际关系的具体心理与行为机制。

2. 理论内涵与研究进展

2.1. 互惠性孝道

孝道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理解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文化心理变量。作为中华文化中维系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伦理与心理价值，其核心就在于子代与亲代之间的理解。古时的孝道如周代提出的“三德”、《左传》提出的“六顺”以及孔孟思想等，贯穿百代都是带有很强的道德教化，他们强调孝道即尊敬并服从师长，这也是维系家庭代际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但随着时代的改变，在现代经济接入全球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家庭规模也不再像以前的多子女的情况下，传统的孝道也在发生变化。有学者认为孝道已是过去式，传统孝道被贴上“迂腐”的标签，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即使社会转型给各个领域带来巨大冲击，传统孝道文化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且传统孝道正随着时代变迁转变为一种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新型孝道(汤一介，2009)。随着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推进，孝道不仅仅有单一的传统道德规范这一面，还有与个体心理结构和社会功能相结合的一面。

叶光辉与 Bedford (叶光辉，2009；Yeh & Bedford, 2003)提出的二元孝道模型是当前研究孝道心理结构的主流框架。该模型将孝道区分为权威性孝道与互惠性孝道两个相对独立但并存的维度。其中，互惠性孝道是指个体基于亲子情感联结、感恩体验与关系维护动机，自愿地对父母表现出的关怀、支持与回馈倾向，它包含了“尊亲恳亲”和“奉养祭奠”两个维度，对应儒家伦理中的“亲亲”原则，强调两代人之间的相互关心与支持(叶光辉，2009)。该取向强调的是亲子关系中的情感对等与相互支持，关系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关注“关系本身”的维系，而不仅仅是履行社会角色义务。在如今的大环境中互惠性孝道看上去更符合现代家庭关系中平等化、情感化的发展趋势。与互惠性孝道不同，权威性孝道包含“抑己顺亲”和“让亲荣亲”两个维度，对应儒家伦理中的“尊尊”原则，涉及与自我压抑、顺从权威相关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强调服从与等级秩序(孙鹃娟等，2025)。

互惠性孝道注重亲子之间的情感基础,强调的是亲子双向平等、相互尊重,这也有利于个体独立自主和成长成熟的发展。相比之下,权威性孝道则更偏向单一的道德规范,重视阶级秩序、长幼尊卑,这里的亲子关系与互惠性孝道相比,则显得不平等,权威性在这样的关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孝道下成长的子女会服从于父母权威,遇事大多参考父母的意见,既有研究表明,较高水平的权威性孝道与部分自主性、自我发展指标之间可能存在负向关联,但其作用并非必然消极,而可能受到家庭文化、亲子关系以及具体情境等因素影响(傅绪荣等, 2016; 杨立华, 2017; Leung et al., 2010)。基于此权威性孝道家庭子女在发展上可能会缺少自我控制,从而抑制自身的全面发展(叶光辉, 2009)。从对互惠性和权威性孝道家庭的分析来看,互惠性孝道更注重亲子关系中的情感联结、感恩回馈与双向支持,更符合现代社会中平等化、情感化的家庭互动特征。

本研究以互惠性孝道为核心自变量,重点考察其与数字化代际支持及家庭代际团结之间的关系。权威性孝道作为二元孝道理论中的另一维度,不属于本研究的核心研究变量,因此不纳入主要模型。大量研究表明,相较于权威性孝道,互惠性孝道与个体的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亲子关系质量呈现更稳定、更积极的关联(Yeh & Bedford, 2003)。Yeh 和 Bedford 的研究发现,互惠性孝道能够正向预测移情、观点采择、自我暴露等。在大学生群体中,互惠性孝道已被证实能够显著预测其家庭责任感(李启明, 2014)、代际支持意愿(胡安宁, 2017)以及亲社会行为水平等,这是理解当代年轻一代家庭价值取向转变的重要心理变量。现有研究多停留在主观态度层面,对互惠性孝道如何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代际互动行为,还有能不能与权威性孝道相结合以及对家庭代际团结的作用机制,仍然缺乏系统探讨。

2.2. 代际团结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城镇化以及数字化发展不仅改变了家庭结构,也持续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方式与代际关系。代际团结是理解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理论概念,其核心在于考察不同代际家庭成员之间在联系、情感、支持和价值认同等方面形成的关系联结。

国外关于家庭代际关系的系统理论研究始于 Bengtson 等提出的代际团结理论。Bengtson 与 Roberts (1991)将代际团结区分为结构性团结、联系性团结、功能性团结、一致性团结、情感性团结和规范性团结六个相互关联但具有不同内涵的维度。其中,结构性团结主要反映家庭成员之间客观的结构条件,如家庭成员数量、代际间地理距离及居住安排等;联系性团结主要体现代际成员之间互动和联系的频率与方式;功能性团结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在经济、照料、信息及其他资源方面的相互支持与交换;一致性团结反映代际成员在价值观、态度和意见等方面的相似程度;情感性团结主要体现亲子之间的亲密、信任、理解和情感依恋;规范性团结则体现家庭成员对代际责任、家庭义务及相互支持规范的认同(Bengtson & Roberts, 1991)。

这一多维理论框架提示,代际团结并非单一的家庭关系质量指标,而是由不同层面的关系联结共同构成的综合性家庭关系状态。不同类型的家庭互动行为可能作用于代际团结的不同维度,而且不同维度之间并不一定呈现完全一致的变化。例如,子代向父母提供数字技术指导、健康信息搜索、移动支付帮助或智能设备操作支持,首先可能表现为功能性团结和联系性团结的增强;在持续互动过程中,如果数字支持能够提高双方沟通效率、增加共同活动和信息交换,也可能进一步促进情感性团结。然而,数字反哺并不是产生单向的积极关系后果。当数字指导过程中存在代际认知差异、沟通不耐烦或权力感知不平等时,数字支持也可能伴随冲突和关系压力。因此,数字反哺对代际团结不同维度的影响可能具有差异性,需要避免将数字支持行为简单等同于整体家庭关系改善。

本研究将家庭代际团结理解为包含结构、联系、功能、情感、共识与规范等不同维度的多层次关系结构,并特别关注数字反哺可能涉及的联系性、功能性和情感性团结。需要指出的是,结构性团结更多

反映地理距离、家庭结构等相对稳定的客观条件，并非数字反哺能够直接改变的关系维度；一致性和规范性团结则更多涉及价值观念及家庭规范，其变化可能需要更长期的互动过程。因此，本研究在整体模型中仍将家庭代际团结作为综合性关系结果变量，同时将上述不同维度视为理解数字反哺作用机制的重要理论背景，而不预设数字反哺对所有维度具有相同方向和相同强度的影响。

既有研究也表明，代际情感联结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支持交换存在密切联系，代际支持并不仅仅表现为物质或功能性交换，也可能受到情感和家庭规范的共同影响(Connidis & McMullin, 2010)。良好的代际团结能够增强家庭成员的归属感、安全感，并可能缓冲代际冲突(Lüscher & Pillemer, 1998; 王更, 徐剑, 2024)。然而，现有研究较多从人口学特征、父母健康状况及家庭结构等方面解释代际团结，对于年轻一代心理价值取向以及数字化家庭支持行为如何共同影响不同层面的代际团结，仍缺乏系统解释。

在数字化背景下，家庭代际团结的形成因此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面对面交往和物质支持。数字媒介使信息交流、技术指导、线上互动以及数字生活协助成为新的代际支持形式。数字反哺可能首先通过增加代际联系和功能支持影响家庭关系，并在特定沟通环境下进一步影响情感联结。

2.3. 数字反哺

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以及交流方式，成为家庭和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电视剧中“青春期撞上更年期”，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数字化与老龄化交织，两者碰撞产生了很多问题，也出现了很多现象，其中数字反哺这一行为打破了传统的亲代向子代单向传递的模式，体现出双方互惠的特征。Correa (2014)将数字反哺描述为“自上而下的知识技术传递”，周裕琼和丁海琼认为数字反哺是年轻一代即子代对年长一代即亲代进行数字知识、技术指导的一种行为，是一个涉及代际双方互动的过程(周裕琼, 丁海琼, 2020)。结合学者研究，本文认为数字反哺是指在数字化的社会背景下，子代利用自身在数字技术和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对亲代提供智能化支持与数字空间生活协助的行为过程。这是一种新型的数字生活和使用方式，也是一种新型青年文化的体现，并且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家庭之中(朱丽丽, 李灵琳, 2017)。我们所理解的中国传统家庭结构中，亲代的权威地位很高，亲代的教诲是他们在自身旅途中总结的经验，“前车之鉴”在如今同样是重要的。而科技时代的发展，数字化智能化迅速崛起，在数字空间中年轻一代逐渐变成传统家庭结构中的“亲代”，而亲代与子代也能通过数字反哺的方式减小双方之间的“鸿沟”，从而增进彼此关系。

数字反哺作为一种新型的代际支持方式，对家庭代际关系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年长群体处于一种信息贫困的处境，加上数字媒体的复杂和思想的落后等，导致他们无法像年轻一代那样轻易在数字化的社会获取和使用信息，“后喻文化”的出现也体现出数字反哺的重要性(张艳丰等, 2025)。家庭关系中不再是亲代的传统单向教育模式，子代也可以是家庭中的“亲代”，从而形成知识双向传递。但关于数字反哺的效果，既有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数字反哺确实可以提高年长一辈的手机使用技能(朱秀凌, 2018)。但另一方面研究发现，数字反哺往往只是使年长一代更快进入数字时代，参与到智能化的场景，但却并不能提高他们的数字生活空间能力，不能独立使用数字媒介(Cáceres & Chaparro, 2019)。

现有研究表明，数字反哺行为不仅仅是技术传递，它能够有效提升年长一辈的社会参与感和主观幸福感，并改善亲子沟通质量(朱秀凌, 2018)。互惠性孝道强调情感联结、感恩回馈和关系维护，因此具有较高互惠性孝道水平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识别父母在数字生活中的困难，并主动利用自身数字能力提供支持。数字反哺因此可以成为个体将孝道价值取向转化为具体家庭支持行为的重要行为表现。然而，数字反哺效果不一致的研究结论，预示着数字反哺的作用可能会依赖于特定的心理动因与家庭情境。因此，数字反哺不是单纯的技术帮助，而是一种具有代际支持和关系维系功能的家庭行为，将数字反哺行为视为本文研究的互惠性孝道影响家庭代际团结的中介机制，合理也有现实解释力。

2.4. 代际沟通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互联网+的时代,“飞鸽传书”已变成万物互联。从原始动作到语言到电报电话到科技时代的通信,沟通方式千变万化。在人际传播中,沟通能力、沟通质量、沟通效果等被认为是影响人们沟通意图和行为的重要因素(Canary & Spitzberg, 1987)。代际沟通是分属不同年龄段的群体或个体之间的交流互动、信息传播及意义传递(Law et al., 2019)。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沟通能力以及沟通有效性的想法可能会影响其与年长一代的对话情况(Holman & Kellas, 2015)。一般来说,年轻一代如果觉得年长一代的建议适行,那么会认为沟通有效,就可能听从年长一代,保持与年长一代的沟通,年长一代也会觉得这样的沟通有效。但实际情况是,年轻一代可能并不在意年长一代对沟通的看法,并不在意年长一代的建议,年轻一代觉得沟通有效就有效,他们自己的想法才是预测后续态度和行为的关键(高芳芳, 2025)。

代际沟通大部分是与家庭内部交流有关,而如今先进的数字技术及其形成的媒介系统为代际沟通提供了新的方式,深度构建了亲代与子代之间的交流互动关系(姚晓鸥, 申培丰, 2024)。在影响因素上,从代际沟通的视角出发,既有研究发现沟通能力、沟通质量(Afifi et al., 2008)、认知信念和情感反应(Aloia & Warren, 2021)以及亲子关系和关系满意度(阎云翔, 杨雯琦, 2017)等皆会显著影响家庭中的沟通情况。家庭沟通模式理论指出,代际沟通是指家庭中代际成员在信息交流、情感表达与意义建构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互动方式(Koerner & Fitzpatrick, 2002)。家庭沟通模式理论将其划分为对话取向与一致性取向两个核心维度。对话取向强调开放交流、情感表达与平等讨论;一致性取向则强调一致性、权威与服从。不同沟通模式塑造了家庭成员对彼此行为意义的理解方式。家庭沟通中不同程度的遵从关系和对话关系体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一致关系、冲突关系及解决冲突的方式差异(Koerner & Fitzpatrick, 2002)。

在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下,家庭成员相信开放和频繁的沟通对于和谐愉快的家庭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鼓励所有人都参与到广泛自由的家庭讨论与互动中(Koerner & Fitzpatrick, 2002)。高对话取向的家庭往往将与子女的沟通视作是教育和交往的重要手段。而一致性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则要求家庭成员在观点态度方面尽可能保持一致,从而避免家庭冲突。高一致性取向的家庭在代际关系上强调子女对父母权威的顺从,力图保持长幼有序、等级严格的家庭结构(Koerner & Fitzpatrick, 2002)。例如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家庭伦理,一部分家庭会受此影响,强调对子女的管教。黄超(2018)提出,当前接近四分之三的中国家长对子女采取沟通较少的专制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对话取向和一致性取向往往呈负相关关系,但两者并不互斥。事实上,这两种模式或多或少地在大多数家庭中同时存在,这对家庭的影响往往互相依赖。虽然家庭沟通模式理论源于西方,但仍适用于我国的家庭代际沟通中(Zhang, 2007)。

代际沟通模式是连接心理价值、行为表达与关系结果的重要情境变量,家庭代际沟通对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及家庭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Hummert, 2015)。研究发现,来自高对话取向家庭的年轻一代往往具备更强的沟通能力,能够在家庭中畅所欲言,如放松地与年长一代讨论敏感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等(Scruggs & Schrod, 2021)。相对地,来自高一致性取向家庭地青年人往往代际沟通频率较低,且更倾向于在待机互动中避免冲突、保持和谐。

2.5. 数字反哺的情境因素及潜在混杂变量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数字反哺发生频率、互动方式以及可能产生的家庭关系后果均受到家庭结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代际互动情境的共同影响。因此,在讨论“互惠性孝道-数字反哺-代际团结”关系时,有必要考虑潜在的社会结构和家庭情境因素,以避免将不同家庭背景下的差异简单归因于个体心理变量。

首先,城乡背景可能影响家庭成员的数字资源获得、数字基础设施条件以及代际数字互动机会。不

同地区在网络基础设施、数字服务普及程度以及老年人数字参与环境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城乡差异既可能影响父母对数字支持的需求，也可能影响子女实施数字反哺的机会。在研究中，如果忽略城乡背景，可能高估或低估个体心理因素与数字反哺之间的关系。

其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也是需要关注的重要情境因素。数字反哺的发生不仅取决于子女是否具有数字技能，也与家庭是否具有相应的数字设备、网络条件以及数字服务使用机会有关。例如，智能手机、电脑及其他数字设备的拥有情况可能影响父母接受数字支持的需求与频率，而家庭经济条件也可能影响其获得数字技术服务的能力。因此，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同时与数字反哺和家庭代际关系相关，在模型分析中具有潜在混杂作用。

再次，亲子之间的地理距离可能改变数字反哺的表现形式及其发生频率。对于与父母共同居住或居住距离较近的年轻人而言，数字反哺可能更多表现为面对面的设备操作指导和即时帮助；对于长期异地居住的亲子而言，数字反哺则可能更多通过电话、微信视频、远程操作指导以及线上信息分享等方式实现。因此，地理距离不仅影响代际接触频率，也可能改变数字反哺与代际团结之间的作用方式。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较高频率的数字互动并不必然意味着较高水平的代际团结，其关系仍可能受到沟通质量和互动体验的影响。

此外，数字反哺所涉及的具体应用类型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关系后果。数字反哺并非单一行为，而可能涉及娱乐休闲、健康信息获取、移动支付、网络购物、社交媒体使用、公共服务以及生活事务办理等多个领域。不同数字应用具有不同的功能属性和互动要求。例如，娱乐类应用可能主要增加共同活动和交流机会，健康信息和生活事务类应用可能更多体现功能性支持等。因此，将不同数字应用情境完全视为同质性的数字反哺行为，可能掩盖数字反哺与代际团结之间关系的异质性。

父母自身的数字能力同样可能影响数字反哺的发生。父母数字技能较低时，其接受子女数字支持的需求可能较高，但如果数字能力过低，也可能导致数字支持过程持续时间更长、互动成本更高，从而增加代际互动中的摩擦。相反，当父母已经具有较高的数字能力时，子女进行技术指导的需求可能下降，但双方仍可能通过共同使用数字媒介进行信息交换和情感互动。因此，父母数字能力可能同时影响数字反哺的需求水平及其互动性质。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数字反哺理解为纳入具体家庭情境中的代际支持行为，而非完全由个体心理倾向决定的单一行为变量。在实证研究中，应适当收集城乡背景、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亲子地理距离以及父母数字使用情况等基本信息，并将其作为潜在控制变量或描述性变量。同时，对数字反哺涉及的具体应用类型进行测量，以进一步判断不同数字支持情境是否存在差异。

3. 结论与展望

数字化发展正在改变家庭成员之间的信息流动、互动方式以及代际支持模式。年轻一代凭借数字知识和技术优势向父母提供数字技术指导、信息支持和数字生活协助，使数字反哺成为理解当代家庭代际互动的重要切入点。

基于二元孝道理论与代际团结理论，本文构建“互惠性孝道－数字反哺－家庭代际团结”的理论框架，并将代际沟通模式作为重要的家庭互动情境变量。需要指出的是，家庭代际团结并非单一维度的关系结果，而是包括结构性、联系性、功能性、一致性、情感性和规范性团结在内的多维关系结构。数字反哺首先可能通过增加代际互动、信息交换和家庭支持影响联系性与功能性团结，并可能进一步通过持续互动和积极关系体验影响情感性团结；而其对于价值一致性和家庭规范的影响，则可能受到家庭文化、沟通模式以及长期互动经验的共同影响。因此，本研究并不预设数字反哺对代际团结所有维度具有相同方向和相同程度的影响，而是将整体代际团结作为综合性关系结果，同时将其不同维度作为解释数字反

哺关系效应的重要理论基础。

此外,数字反哺具有明显的情境依赖性。城乡背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数字设备可及性、亲子地理距离、父母数字能力以及具体数字应用类型等因素,均可能影响数字反哺的发生机会、互动方式及其关系后果。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在控制相关背景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不同家庭情境下数字反哺的作用机制,并比较不同数字应用场景下数字支持与代际关系之间的差异。

在研究方法方面,未来可以进一步采用多维度测量、多主体配对数据以及纵向研究设计,将子女和父母双方的报告结合起来,以检验数字反哺对不同代际团结维度的差异化影响。同时,可进一步区分技术指导、信息支持、生活事务协助以及情感互动等不同类型的数字反哺行为,考察其是否具有不同的心理与关系后果。通过将个体心理价值、具体数字支持行为与家庭结构和互动情境结合起来,可以更加全面地解释数字化背景下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

致 谢

该论文受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25XKT0496)。

参考文献

- 曹惟纯,叶光辉(2014). 高龄化下的代间关系. *社会学研究*, (2), 116-144.
- 傅绪荣,汪凤炎,陈翔,魏新东(2016). 孝道:理论、测量、变迁及与相关变量的关系. *心理科学进展*, 24(2), 293-304.
- 高芳芳(2025). 当亲近遇到疏离:数字环境下“Z世代”的代际沟通回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9(6), 143-152.
- 胡安宁(2017). 老龄化背景下子女对父母的多样化支持:观念与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 (3), 77-95, 205-206.
- 黄超(2018). 家长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及其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社会*, 38(6), 216-240.
- 李启明(2014). *孝道的代际传递及其对老人的积极效应*.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 刘汶蓉(2016). 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 *社会学研究*, 31(4), 123-140, 245.
- 孙鹃娟,李豪豪,袁喆(2025). 数字时代的孝道分化:互联网使用如何形塑二元孝道观念. *青年研究*, (6), 169-187, 193.
- 汤一介(2009). “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6(4), 11-13.
- 王更,徐剑(2024). 代际团结视角下家庭阅读对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图书馆论坛*, 44(12), 64-74.
- 夏当英,张雨豪(2024). “快速社会化”:数字时代青少年社会化趋向、困境与纾解.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6(4), 110-120.
- 阎云翔,杨雯琦(2017). 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 *探索与争鸣*, (7), 4-15.
- 杨立华(2017). 敬、慕之间:儒家论“孝”的心性基础. *江苏社会科学*, (5), 131-135.
- 姚晓鸥,申焙丰(2024). 家庭沟通媒介化中的脱嵌与游离:基于家庭代际间某疫苗信息微信平台沟通的考察. *新闻春秋*, (1), 76-85.
- 叶光辉(2009). 华人孝道二元模型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本土心理学研究*, 32(12), 101-148.
- 张艳丰,刘敏,洪闯(2025). 数字反哺视角下子代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影响因素与拓扑路径研究. *图书馆学研究*, (4), 125-137.
- 周裕琼,丁海琼(2020). 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国际新闻界*, 42(3), 6-31.
- 朱丽丽,李灵琳(2017). 基于能动性的数字亲密关系:社交网络空间的亲子互动.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7(5), 95-104.
- 朱秀凌(2018). 手机技术反哺、亲子沟通与父母教养方式——基于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的分析. *新闻大学*, (4), 108-119+155.
- Afifi, T. D., Joseph, A., & Aldeis, D. (2008). Why Can't We Just Talk about It? An Observational Study of Parents' and Adolescents' Conversations about Sex.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23, 689-721.
<https://doi.org/10.1177/0743558408323841>

- Aloia, L., & Warren, R. (2021). Cognitive Beliefs About, Affective Reactions To, and Behavioral Preferences for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69, 113-132. <https://doi.org/10.1080/01463373.2021.1881576>
- Bengtson, V. L., & Roberts, R. E. L. (1991).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n Aging Families: An Example of Formal Theory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3, 856-870. <https://doi.org/10.2307/352993>
- Cáceres, R. B., & Chaparro, A. C. (2019). Age for Learning, Age for Teaching: The Role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ra-Household Learning in Internet Use by Older Adults in Latin Americ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2, 250-266. <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17.1371785>
- Canary, D. J., & Spitzberg, B. H. (1987). Appropriateness and Effectiveness Perceptions of Conflict Strategie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4, 93-120. <https://doi.org/10.1111/j.1468-2958.1987.tb00123.x>
- Connidis, I. A., & McMullin, J. A. (2010). Sociological Ambivalence and Family Ti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 558-567.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02.00558.x>
- Correa, T. (2014). Bottom-Up Technology Transmission within Families: Exploring How Youths Influence Their Parents' Digital Media Use with Dyadic Dat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4, 103-124. <https://doi.org/10.1111/jcom.12067>
- Holman, A., & Kellas, J. K. (2015). High School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the Parent-Child Sex Talk: How Communication, Relational, and Family Factors Relate to Sexual Health. *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80, 388-403. <https://doi.org/10.1080/1041794x.2015.1081976>
- Hummert, M. L. (2015).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W. Donsbach (Ed.),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pp. 273-275). Blackwell Publishing.
- Koerner, A. F., & Fitzpatrick, M. A. (2002). Understanding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Family Functioning: The Roles of Conversation Orientation and Conformity Orientation.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6, 36-65. <https://doi.org/10.1080/23808985.2002.11679010>
- Law, J., Young, T. J., Almeida, J., & Ginja, S. (2019).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An Interdisciplinary Mapping Review of Research between 1996 and 2017. *Journal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17, 287-310. <https://doi.org/10.1080/15350770.2018.1535349>
- Leung, A. N. M., Wong, S. S. F., Wong, I. W. Y., & McBride-Chang, C. (2010). Filial Piety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in Hong Kong Early Adolescents.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30, 651-667. <https://doi.org/10.1177/0272431609341046>
- Loges, W. E., & Jung, J. (2001). Exploring the Digital Divide: Internet Connectedness and Ag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 536-562.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01028004007>
- Lüscher, K., & Pillemer, K. (1998). 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 in Later Lif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0, 413-425. <https://doi.org/10.2307/353858>
- Scruggs, X., & Schrod, P. (2021). The Frequency and Comfort of Political Conversations with Parents as Mediators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Relational Quality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21, 17-33. <https://doi.org/10.1080/15267431.2020.1860053>
- Yeh, K. H., & Bedford, O. (2003). A Test of the Dual Filial Piety Model.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 215-228. <https://doi.org/10.1046/j.1467-839x.2003.00122.x>
- Zhang, Q. (2007).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Conflict Styles in Chines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55, 113-128. <https://doi.org/10.1080/01463370600998681>
- Zhou, B. H., & Gui, S. H. (2017). WeChat and Distant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A Study of Online Content Sharing on WeChat. In K. Xue, & M. Yu (Eds.),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Change in Asia* (pp. 185-206).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981-10-6710-5_11